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研究

刘素民 著

On Thomas Aquinas' Ethic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研究

刘素民 著

On Thomas Aquinas' Ethic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研究 / 刘素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61-4189-2

I. ①托… II. ①刘… III. ①阿奎那, T. (1225 ~ 1274) —伦理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03.21②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810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390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父亲与姐姐

序

在中世纪欧洲曾经出现过一位举世闻名的伟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25—1274), 他的理论为后人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思想贡献。相应地, 国外学者对其思想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 相关的思想研究在我国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因此, 不少人对其伦理学思想缺乏足够的了解与认识, 其哲学理论的深刻价值也就无以全方位展示。有鉴于此, 本人根据多年的学习与积累撰写此书, 希望拙作的出版能够将此遗憾稍加弥补、为国内同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助力加油。

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诞生于中世纪丰腴的基督教文化土壤中。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国王的“养士”之风、大学与修会的建立、十字军东征开辟的东西方思想交流渠道等无不成为其伦理学重要的社会与历史成因。而“思想”与“存有”的连接问题则决定了这一理论内在的思想方法与理论气质。托马斯以理性为工具, 以思辨的方式, 通过因果原则的层层推进, 在“共相之争”中取得胜利, 成就了经院哲学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思维模式和实在论的哲学主张, 表现为由知识论入手走向形而上学之“体”、再落实于伦理学之“用”的思想进路, 由此, 知识、存有(存在)和道德在“人是上帝的肖像”的前提下得以有效定位。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的思想架构中, 世界、人、上帝各就各位又彼此相关。托马斯在对人的理性能力表现出高度的信心与期许的同时, 也指出了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 在强调人的社会性的同时, 也对个人的精神与伦理道德做出了特别强调——人作为其所在团体中的一员, 能够以其道德行为在德与罪之间践履一条不偏不倚、公允平衡的“执中”的思想路线。人是“上帝的肖像”, 因此而成为有理性、有自由意志的独立的个体, 这是人之“人格(位格)”所在, 也是其不安于时间的限制、不满

足于世间短暂的幸福，从而追求无限、期盼永恒，以此肯定自己精神不朽的根本原因。托马斯·阿奎那运用哲学的方法、透过神学的视角，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寻求人的本体存在与人性超越价值的努力不仅铸就了他思想的深度，也决定了他的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不朽地位。

拙作的这项研究得益于本人于2008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前有幸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因此，非常感谢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导师赵敦华教授悉心的学术指导与帮助。这项课题最终完成、结项报告荣获“良好”等级并获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稿约，离不开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各位同仁、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以及学界相关专家的大力提携与支持。此外，还有我的导师武汉大学段德智教授一直以来对我的激励与鞭策，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台湾辅仁大学两位前校长李震教授和黎建球教授多年来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鼓励，感谢二位老师及时赠与我由中华道明会和碧岳学社联合出版的汉语版全套精装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一并感谢台湾辅仁大学“士林哲学研究中心”高凌霞教授在托马斯思想研究和新托马斯思想研究等方面给予我的持续不断的启迪、指教和无私帮助。

在这项课题开展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的支持与帮助，他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动力。我应邀作为“托马斯·阿奎那年度讲座”的讲座人于2013年4月访问爱尔兰，从而有机会在那里介绍中国学者的托马斯研究，并就相关问题与学者们展开深入研讨。因此，我衷心感谢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哲学系系主任 Professor Michael Dunne 的盛情邀请和慷慨帮助，感谢他此前与此后赠送的书籍，特别是那本拉丁文单行本《神学大全》（*Sancti Thomae de Aquino Summa Theologiae*, san paolo s. r. l. , 1988）。

非常感谢英国牛津大学的 Professor Vivian Boland 和“牛津大学 Blackfriars 阿奎那研究所（the Aquinas Institute at Blackfriars, Oxford）”为我提供的访问学习的机会以及持续至今的学术联系。在 Professor Vivian Boland 帮助下，我荣幸地得到来自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的学者 Mr. Wojciech Golubiewski 所赠的出版于19世纪的6卷本拉丁文《神学大全》（*Divi Thomae Aquinatis Summa Theologica, Editio Altera Romana ad emendatiores Editiones Impressa et Noviter Accuratissime Recognita*, Romae ex Ty-

pographia Forzani et S. , 1894)。一并感谢波兰大使馆外交官 Mr. Krzysztor Malczewski 不辞辛苦从波兰带书到北京给我。

感谢美国加州伯克利“对华学术交流联合会 (China Academic Consortium)”的 Ms Martha Chen 提供给我访美学习与交流机会；感谢在美国洛杉矶的 Mr. Chuck Robertson 为我和我的儿子在美国访问期间的生活所提供的无私帮助。几年来，Mr. Chuck Robertson 在宗教与哲学相关研究方面为我提供了不少新视角与好建议。2013 年，他将自己藏书中一些有关宗教与哲学研究、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等方面的英文版经典著作无偿赠与我，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春风主任为此书的出版所进行的认真筹划与严谨校改。感谢我亲爱的儿子温暖的陪伴，让我辛苦的写作生活充满阳光。在此一并附记。

是为序。

刘素民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

2014 年 3 月

目 录

序	(1)
引言	(1)
第一节 托马斯·阿奎那行谊	(1)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4)
第三节 《神学大全》中的伦理学	(16)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	(21)
第一章 理论成因与思想特征	(26)
第一节 宗教与文化的融合	(27)
第二节 知识与本体的连接	(31)
第三节 托马斯学说的哲学进路	(40)
第四节 “大全”体系“上通下贯”	(57)
第二章 人性行为的构成（一）	(61)
第一节 灵魂的本质与一般机能	(63)
第二节 灵魂的特定机能	(69)
第三节 理智领悟的方式与程序	(82)
第三章 人性行为的构成（二）	(96)
第一节 人的最终目的	(97)
第二节 幸福	(102)
第三节 意志行为	(114)
第四节 善、恶与激情	(132)
第四章 人性行为的内在原则	(175)
第一节 习性	(176)
第二节 德性	(184)
第三节 恶习与罪	(200)

第五章 人性行为的外在原则	(228)
第一节 法律思想的理论来源	(228)
第二节 法律的本质、效果与区分	(239)
第三节 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与神法	(246)
第四节 人定法的权利与改变	(278)
第六章 思想价值与历史影响	(285)
第一节 “人是上帝的肖像”	(286)
第二节 理性与信仰的整合	(296)
第三节 重返“存有”寻找“完整存在的人”	(305)
第四节 托马斯哲学可能提供的借鉴	(322)
附录一 托马斯·阿奎那大事年表	(344)
附录二 托马斯·阿奎那主要著作	(349)
参考文献	(356)

引言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4/1225 – 1274) 是“经院哲学 (*Philosophia Scholastica*, Scholastic Philosophy, Scholasticism)”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天主教“托马斯学说 (Thomism, 托马斯主义)”的创立者,堪称西方中古时代思想界的巨人。

第一节 托马斯·阿奎那行谊

托马斯·阿奎那生于1224年终或者1225年春,出生地在意大利南部那布勒斯附近的洛卡塞城堡 (Roccasecca)。他的父母都是当地的望族。托马斯父兄多为军人,服务于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1194 – 1250) 的麾下,退役后历任公职。5岁左右时,托马斯·阿奎那被父亲送到离家不远的著名的卡西诺修道院的本笃会院 (Order of St. Benedict) 当修童,父母希望将他培养成这个修道院有钱有势并且拥有崇高地位的隐修院院长 (Abbas)。小托马斯在卡西诺修道院勤奋学习了九年,沉默寡言,手不释卷。18岁左右时,托马斯·阿奎那加入“道明会 (*Ordo Dominicanorum*, the Dominican Order)”。

1245年,托马斯·阿奎那被修会送到巴黎的圣雅克会院 (Saint – Jacques) 学习,受教于名师大阿尔伯特 (Albertus Magnus, 约1200 – 1280)。三年后,托马斯担任了这位名师的助教,协助新课程的规划。大阿尔伯特以博学著称,在当时被誉为“全能博士 (Doctor Universalis)”和权威。托马斯·阿奎那如饥似渴地从大阿尔伯特的课堂上汲取知识营养。因为年轻的托马斯常常专注于思考问题,极少与同学们交谈与嬉闹,常被同学误认为是因为功课不好而怀揣自卑,因而从同学那里得到了一个绰号:“西

西里哑牛 (the dumb ox of Sicily)”。为此,了解托马斯且对其寄予厚望的大阿尔伯特不无感慨地向学生们宣布:“我敢预言,你们所称呼的哑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且将震撼世界。”

1256年,31岁的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毕业,取得了学位和教职。后来,他与友人博纳文图拉 (Bonaventura, 1221 - 1274) 一起取得神学博士学位。之后,便开始了为期三年在母校任教的工作。从1269年到1272年,托马斯·阿奎那再次赴巴黎大学讲学。此外,托马斯还在罗马及意大利其他的城市教书,同时开始著述。此时的巴黎大学学术风气正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际,流行的思想潮中有奥古斯丁主义 (Augustinism) 也有阿维罗伊主义 (Averroism) 所注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Aristotlism), 更有极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此同时,由于巴黎大学的两大修会“道明会”与“方济会 (*Ordo Fratrum Minorum*, Franciscan)”原本就对哲学持有不同见解。为了辨明真理,两个修会之间兴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作为“道明会”成员,托马斯·阿奎那凭借自己无与伦比的学识与能力成就了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常胜论辩将军角色,他的名气也从此开始如日中天。

托马斯·阿奎那在自己的修会里积极地侍奉、频繁地旅行和讲学,并且经常向教皇提出有关各地政务的建议。在传教的同时,托马斯每天勤奋著书立说,不求名利。他的写作包括各种训诫、问答集、授课笔记以及他的巨著《神学大全》,等等。教会曾提供给他那不勒斯的大主教和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的职位,但都被他婉拒了。在1273年12月6日的一次弥撒仪式上,托马斯·阿奎那称自己看见了神迹。事后他停止写作,没有完成《神学大全》的最后部分。1274年1月,格里高利十世 (Pope Gregory X, 约1210 - 1276) 指派托马斯·阿奎那参加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 (Council of Lyons), 委托他调查并且研究希腊与拉丁教会之间的差异。由于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在前往会议的旅程中,托马斯因病停留于侄女的城堡。其间,他的病情开始恶化。托马斯希望在修道院里走完余生,遗憾的是,病危的他终究无法及时抵达他心所属的“道明会”的教堂,而是被送至一座熙笃会 (*Cistercenses*; Cistercians) 的教堂。在经历七周的病痛煎熬后,1274年3月7日,托马斯·阿奎那因病离世,时年不足50岁。

在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托马斯·阿奎那集教师、圣徒、神学家、哲学家等身份为一体,融合了希腊、希伯来、犹太的哲学思想的优秀成果,建构起“经院哲学”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体系,从而在形而上学、认识论、

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托马斯的哲学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并特别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后起的“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学派，多以他的思想体系为中心而研究哲学。

托马斯·阿奎那一生才学出众，著述等身，其代表作主要有《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论存在者与本质》(*on Being and Essence*)等。1323年，教皇约翰廿二世(Joannes XX II)追谥托马斯·阿奎那为“圣徒”；1567年托马斯被命名为教义师，并被授予“天使博士(*Doctoris Angelici*, angelic doctor)”的称号。托马斯学说在1879年被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正式定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即“托马斯主义(Thomism)”。它是“经院哲学”的最高成果，也是中世纪神学与哲学最大、最全面的体系。1987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辞典》和英国1985年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从贡献和影响方面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位居第四。1999年，BBC评出千年十大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位居第五。

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经后人整理为全集(*operaomnia*)的有许多种，其中以1882-1884年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 1810-1903)组织编订的为定本。按照哲学史家吉尔松(Etienne Gilson, 1884-1978)的分类方式，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主要包括：神学著作类(Theological Syntheses)、学术讨论类(Academic Disputations)、圣经注释类(Expositions of Holy Scripture)、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类(Expositions of Aristotelian Works)、其他注释类(Other Expositions)、争辩文类(Polemical Writings)、特别论题论文类(Treatises on Special Subjects)、专家见解类(Expert Opinions)、书信类(Letters)、礼仪著作与论道类(Liturgical Pieces and Sermons)、不确定可靠性的著作类(Works of Uncertain Authenticity)等共计100本左右的著作。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力求结构严谨、证据繁博、论证缜密、学理精深，因而影响深远。

托马斯·阿奎那的代表作《神学大全》被认为是基督宗教的百科全书及最重要的教科书之一。七百多年来，《神学大全》被译成世界各主要语言的版本，甚至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修订本问世，足见其重大的影响力。《神学大全》原是托马斯在大学讲堂上的系统讲义，成书于1266至1273年间，全部用拉丁文写成，总字数超过两百多万。虽然，托马斯谦称此著

作只不过是“初学者 (beginner)”使用的关于基督教学说理论的指南手册或导览。然而,事实上,它相当系统地阐释了哲学与神学在当时能够涉及的所有问题。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就是《神学大全》这部著作中重要的理论。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中国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研究起步较晚。如果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一批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想的文人学者诸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对西方哲学的译介与评述作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开端,那么,中国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迄今为止仅历经一个多世纪。在此期间,中西哲学之融合态势逐渐增强。特别是,在努力开创新哲学、新文化的思想过程中,诸如胡适、张君勱、张颐、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一批既有国学功底,又在西方留学的学者开始担任大学的哲学教授,成为职业哲学家。虽然这些早期的中国职业哲学家们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广泛,因而对西方哲学的主要领域诸如希腊罗马哲学、16-18世纪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都有所涉及和了解,并且特别在德国古典哲学、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倾注了较多的力量,逐渐形成了规模与特色。然而,相较而言,起步较晚并一向默默无闻的“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则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与思考,基于此,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大陆长久以来几乎成了无人问津的领域。

一 研究滞后的原因

西方中世纪哲学通常指以西欧经院哲学为主体的哲学,它以奥古斯丁(St. Aurelius Augustine, 354-430)和波埃修(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 480-524)的思想为先声,13世纪进入黄金时期,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体系中登峰造极,在邓·司各脱(Blessed John Duns Scotus, 约1265-1308)和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 约1285-1349)之后走向没落。15世纪中叶,中世纪哲学曾经的辉煌逐渐为文艺复兴思想所取代。

回顾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造成早期中国学

者对西方中世纪哲学无人问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从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当时的西方学者从事哲学研究的思想认识来讲，“中世纪”一向与“黑暗时代”画上等号，因此，“中世纪哲学”势必被视为“黑暗时代的思想”，黑格尔主张“穿七里靴尽速跨过这一时期”^①的方式自然成为当时不少哲学史家（哲学家）的共同看法。如此一来，在西方尚且遭受冷落的中世纪哲学自然不会引起刚刚开始接触西方哲学的中国人的浓厚兴趣。

更何況，西方中世纪哲学本身所蕴含的基督教思想与当时初次大规模相遇的封建中国的儒释道传统还无从找到“理论对话”的可能——虽然明朝末年有所谓“圣教三柱石”，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成为当时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 1610）^②在中国传教期间第一代基督徒里最有成就的三个人。并且，其中的杨廷筠也著有《代疑编》、《代疑续编》、《圣水纪言》、《天释明辨》等作品初涉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可是，这些著作还算不上“研究”，更算不上“哲学探讨”。而无论李之藻的《同文算指》（8卷）等，还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泰西水法》、《测量异同》、《勾股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乃至影响深远的《农政全书》等，其所体现的无外是数学、农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实用技术”之主旨，鲜有哲学论证与学理分析。因此，与其说他们是西方思想的“研究者”，倒不如说是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接纳者”、“介绍者”和相关技术的“推广者”。

另一方面，从当时中国人学习、研究西方哲学的思想角度来讲，虽然当时的王国维与章太炎二位先生较为重视纯粹的学理研究与独立的知识探讨，这对于作为一门“学问（knowledge）”的西方哲学的“学院式”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事实上，受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实用技巧、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的影响，“西方哲学”自进入中国之始就更多地被赋予了服务于“社会之治”的“实用”目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3页。

② 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神父、传教士、学者。185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颇受士大夫敬重，被尊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除了传播天主教教义之外，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学、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的，而其作为“哲学（φιλοσοφία; *philosophia*; philosophy）”之本意所承载的“求知”、“求智”的“纯粹”学术内涵自然而然地被置于较次要的位置。

为了救亡图存、针砭时弊，梁启超先生先后介绍与诠释了西方启蒙思想家如卢梭（Jean - Jacques Rousseau, 1712 - 1778）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以及西方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两大代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 - 162）和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 - 1650）的思想，还有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 1804）的哲学，其贡献令人钦佩。然而，无论如何，梁先生介绍这些思想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讲是为当时中国社会改造之“用”——重“实用”的目的本无可厚非。但是，梁先生似乎忽视了一个问题：无论多么先进的哲学思想，倘若缺乏一定数量的人的深入研究与理解、在其尚未产生相当规模的影响力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拿来“治疗社会之弊端”，那么，或者由于“曲高和寡”，或者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终究不会有多少“用武之地”。

因此，在“引进”西方哲学之初，正是由于当时西方思想对于这些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在服务社会之治方面的巨大吸引力，中国的文人学者才一味地寄希望于借“西方哲学”之“技术”改造中国社会。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流派非理性、非全面的认知，出现了“挑肥拣瘦”、“厚此薄彼”式的理解与介绍。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学院哲学”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中世纪哲学因其缺乏“社会之用”而被“悬置”起来也是意料之中的。

严复是“经验论”的信徒，认为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在严复看来，“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而“古之必敝”——即使尧、舜、孔子生在今天，也要向西方学习的。当时的中国如严复一样的知识分子的确做到了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智慧，然而，正是由于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的原因，西方中世纪哲学在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之始便成为了“缺位”。这也成为中国托马斯·阿奎那研究严重滞后的关键原因。

二 中国大陆的早期研究

实际上，自景教于公元 635 年传入中国起，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相关思想就伴随着传教士开始在我国断断续续地流传了许多个世纪。然而，中

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长久以来并没有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中世纪哲学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也没有及时地、真正有效地开展起来。^① 1957年以后，“左倾”思想一度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哲学教育与研究模式基本上从苏联照搬过来，西方哲学被简单地划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大阵营的对立。其中，唯物主义、辩证法代表进步与合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则代表着反动与荒谬。

在这样的公式规定下，西方中世纪哲学被完全否定，成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相应地，与之相关的基督宗教研究也几乎成了空白。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后西方哲学研究的停滞与倒退。当时，学者们很少能够接触到西方哲学原著，相关的研究与著述也少之又少。受意识形态影响，当时仅存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上面。^②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清槐翻译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以及奥古斯丁著、周士良翻译的《忏悔录》。直至今日，这两本书在学界的良好影响依然不减。

中国大陆“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的有效起步得益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研究的逐渐恢复和文化思想的解放。1978年10月，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界在安徽芜湖召开了“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那是一次在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来自全国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那次讨论会。会议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性质、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不应该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当作僵死的教条，而应当将其对立和发展看作是认识史的一个过程。同时，还应当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和联系。不少学者提出，应当客观地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这次会议无疑成为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研究领域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主义束缚、摆脱苏联哲学模式而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中国大陆学者渐渐开

① 这一时期，港台地区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台湾辅仁大学的学者，但人数不多。

② 为此，贺麟、陈修斋等人提出异议，结果是他们的主张被压制，他们个人也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

始了对西方中世纪哲学的阅读、译介及研究工作，出现了一批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杨真著的《基督教史纲》（上册）。该书作者认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产生于奴隶社会、盛行于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督教已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并渗透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又与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哲学、法律、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互相渗透和影响，乃至形成了一种精神、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作者认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基督教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有利于人们剖析和了解世界历史与政治，具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这本书的观点对于当时开阔学者们的思想视野和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研究的全面恢复，中国大陆学者不仅接续了此前百来年的积累，而且还以从未有过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对西方哲学展开了全方位研究。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哲学研究逐渐远离文艺复兴作家将欧洲中世纪近千年历史贬斥为黑暗时期的主张，很多学者猛然发现基督教哲学研究对于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是何等不可或缺，而“西方中世纪哲学”原本就是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地中一块不应该被人遗忘的沃土。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安东尼·肯尼著、黄勇翻译的《阿奎那》。按照译者的说法，本书“只是一本关于托马斯的生平、时代及其哲学思想的入门性的小册子”^①。但是，鉴于当时中国大陆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极其薄弱，“对像阿奎那这样一位在西方文明史上产生过、并在某种意义上还在产生着重大影响的大师，竟然还没有一本专门的研究著作，本书的翻译出版也许具有更多的意义”^②。此后，“托马斯·阿奎那”这个名字逐渐进入专业学者、学生的视野。

同时，关于中世纪哲学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一批较有影响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涉及西方中世纪哲学的许多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大陆“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学术水

① 安东尼·肯尼：《阿奎那》，黄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② 同上。